

性别·身体·话语·写作

——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研究

尹慧凌

四川外国语大学

摘要：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一支以法国女性主义批评为主，有着丰富文学批评实践和广泛影响的理论流派。她们一方面对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大加批判，对精神分析学说中的“阳物崇拜”论发起了猛烈的抨击，另一方面又大量借鉴和运用精神分析学说的话语，把拉康的精神分析学说作为女性写作的指导原则，提出了“身体写作”“女性话语”“双性同体”和“记号语言”的新概念。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当今世界上最具活力、最为丰富多彩的一种文学批评。

关键词：精神分析学；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身体写作；女性话语；双性同体；记号语言

【DOI】10.12252/j.issn.2096-6288.2022.05.048

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一支以法国女性主义批评为主，有着丰富文学批评实践和广泛影响的理论流派。在20世纪70年代，精神分析和解构主义等思潮席卷西方，彻底改变了西方学术的格局。许多女性主义文学研究者尝试将弗洛伊德与拉康的精神分析的理论和运用到她们的文学批评实践中，从而影响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倾向和实践方法，开启了文学批评理论的新天地——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该批评理论译以人的心理结构为出发点，考察女性的身体、语言、欲望等诸因素的潜意识层面，探讨女性和语言，女性和写作的关系（罗婷 2004）。她们在对待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的态度上，一方面提出尖锐的批评，对精神分析学说中的“阳物崇拜”论发起了猛烈的抨击，另一方面又大量借鉴和运用精神分析学说的话语，以拉康的精神分析学说为其女性写作的指导原则，并提出了“女性话语”和“身体写作”的新概念、女性写作理论和“双性同体”女性书写理论。

一、弗洛伊德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者看来，弗洛伊德的“性别获得”理论毁誉参半，在早些时候，对于弗洛伊德学说，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者的态度基本上是批评，在经过学习和思考之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者的态度有很大的改变，她们重新审视弗洛伊德的主体理论，并试图以弗洛伊德的理论来解读性别主体的获得。因为弗洛伊德建构了一个建立在压抑基础上的基于“社会性别认同”的心理理论，依据弗洛伊德的理论，儿童需要经历几个层次的独特的性心理发展历程，成年人的社会性别正是他（或她）处理这一历程的产物，即女性气质和男性气质是性成熟的产物。如果男孩的性发展正常，那么他们就会成为彰显出人们所期望的男性特征；如果女孩发展正

常，她们也会成为女性特征的女人，这些特征为人们所期望的（黄华，2005）。弗洛伊德认为，女人的女性特征的表现都应该归结于女性生理性的“缺失”。

弗洛伊德关于这种女性特征的观点受到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者的批评和抵制。贝蒂·弗里丹在其《女性的奥秘》中，尖锐地批判了弗洛伊德的这个论断，尝试用重新构建女性性别文化来反击弗氏学说；舒拉米斯费尔斯特通在其《性的辩证法》中，同样表示强烈的批判，她认为弗洛伊德关于女性特质的这种性心理表现强化了对女人的压迫，父权制社会下的女性气质被看作是一个自恋的、被动的和受虐的身份认同；在《性政治》中，凯特·米利特则更坚决地反对各种类型的生物决定论，在笔者看来，弗洛伊德的生物决定论完全忽略了导致两性不平等的社会因素。

20世纪80年代后，对于弗洛伊德理论的态度，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者们开始发生改变，她们不再只是讨伐弗洛伊德的“生物决定论”，而是重新审视弗洛伊德理论中关于主体建构的论述。他们认为弗洛伊德的理论对于颠覆传统的主体观很有启发性能，并指出了无意识欲望的流动对性别认同的动摇。几乎所有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者们都意见统一：弗洛伊德理论仍属于菲勒斯中心主义范畴内的理论，他是基于男性模式而建构他的精神分析学，其中对于女性特征的描述则是从男性模式推导而致。弗洛伊德认为他的结论是建立在观察之上的，然而这些正是父权制对女性压迫的外在表现，（黄华，2005）。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者们依据弗洛伊德忽略的“母亲话语”去发展和修正弗洛伊德理论，她们对于俄狄浦斯情节中母亲和儿子的关系或者在非父权制的语境下阐述俄狄浦斯情结做了重新界定。她们在构建新的性别理论时吸收和发展了弗洛伊德关于儿童在前俄

狄浦斯阶段的双性性欲，无意识给性别认同带来的不稳定性的论述。

二、拉康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雅克·拉康乃弗洛伊德之后最重要的精神分析学家之一，他结合后结构主义理论与精神分析学，运用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对无意识理论重新阐释，他不认同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早于语言的论断，在他看来语言与无意识几乎同时出现。拉康把无意识看作语言的产物，并认为无意识不是无序混乱的，无意识运动的原则，就是语言结构的原则。拉康在主体建构、自我、象征秩序和无意识等方面发展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并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黄华，2005）

在拉康的学说中，主体形成需要历经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拉康称之为“想象级”的状态，期间，婴儿所产生的只是意识的幻觉和碎片，没有形成完整独立的“自我”，而且不分主体与客体；第二时期谓之“镜像阶段”，期间，小孩从镜中见到大人怀中的自己，他认同镜中的形象，并使之成为建立自我的基础。在最后一个时期，小孩进入语言阶段，并开始确定他（她）在象征秩序的主体位置。儿童从想象秩序的自我形象到象征秩序中的主体，期间的转折点和中介，拉康认为这就是所谓的俄狄浦斯情结。拉康理论中的“象征秩序”体现的是父系社会中父权的秩序，以“菲勒斯”为中心。它是以父亲所体现的法律为统治，涉及社会关系和性的关系，引起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者们在思想上的共鸣。她们用拉康的主体理论对菲勒斯中心的观点提出挑战。另外，拉康理论中最受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者们欢迎的是其的象征秩序，或称作语言体系理论，它在心理学与语言学、想象与现实之间的架构起一座桥梁，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者提供了一个更为自由的发挥空间（黄华，2005）。

三、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代表

（一）埃莱娜·西苏与“身体写作”和“双性自体”

埃莱娜·西苏，法国当代著名的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家，她和露丝·伊利格瑞、茱莉亚·克里斯蒂娃被誉为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批判领域三位最有影响的代表性人物。童年的经历对西苏的世界观和文学写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75后的两年间，西苏发表了她的代表性女性主义论文和著作，对女性气质、女性文本和女性主义进行了尝试性的探索和研究。在其《美杜莎的笑声》中，西苏企图颠覆女人作为“他者”的观点，她认为在男权中心社会里，父亲/母亲、太阳/月亮、日/夜、文化/自然、理智/感性、主动/被动等一系列的二元对立中，男

人属于“自我”，居于前者，为正面价值，而女人则沦为“他者”，是排除在中心之外的、用来证明男性价值的“他者”。基于拉康“主体是在语言中建构的”观点，西苏认为，写作也可作为女性的一个手段用以抵抗和颠覆男性“菲勒斯中心”语言秩序，并提出“身体写作”概念。身体写作被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者看作颠覆性的写作形式，它以女性的身体为创作的动力和源泉，此概念包括两点：写身体和用身体去写。“妇女必须通过她们的身体来写作，她们必须创造出无法攻破的语言”，（张京媛，1992）西苏强调女性“身体写作”的目的是为了除去女性压抑、释放女性的潜能，并以此创造属于女性自己的语言和历史，最终确立妇女自己的社会和家庭地位。

西苏的“身体写作”理论事实上是建立在“双性自体”的理念之上。“双性自体”理论最早发轫于英国女性主义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她的《一间自己的房间》中，伍尔夫认为妇女写作的理想是双性自体，她断言意识到自己的性别对任何文学作者来说，是一场灾难。女作家的楷模应是“男化女性或女化男性”。双性自体被看作女性进行文艺创作最好的心灵状态。西苏拓宽了“双性自体”观念，认为前俄狄浦斯阶段应该视作是一个双性时期，无论女性或男性均能使用这种原初的力比多（libido）能量，来创作女性文本。西苏以消解和颠覆男女之间的二元对立为其出发点，并强烈否认男女双性的主要特征的互补性，而强调它们之间的差异，并且特别强调女性身上的那种双性特征，然而大多数男性却一直固守“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单一性。因此，在西苏看来，身体写作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它能消解和吞没“菲勒斯中心”。

（二）露丝·伊利格瑞和她的“女人话语”

露丝·伊利格瑞，法国女性主义作家、诗人和哲学家。她提出的“女人话语”与西苏的“身体写作”非常相似，也是基于女性身体和性欲理念上的书写语言。她曾参加过拉康主持的精神分析研讨班。

拉康认为男性和女性皆存于语言之中，故而男女双方之间都能够以一种与自己的性别相对立的视角或立场，并成为自己性别的对立面。伊利格瑞从拉康性别理论获取灵感而提出了“女人话语”这一概念和思想，并以之作为去“菲勒斯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以及弘扬女性主体意识的一种企图（罗婷，2005）。在她看来，消解“菲勒斯中心”之二元对立，就必须建立新的两性新秩序、新伦理，被压抑的阴性必须另找一个主体的位置，一个有话语权的位置。简而言之，在伊利格瑞看来，女性“需要重新去建构另一种文法或语法规则”，

进而并提出了一套完全区别于男性话语体系的女性力比多(libido)理论。她认为与男性的单一性的性爱不同,女性性爱遍布整个身体,因此,“女性话语”也就应该是流动的、散漫的、多元的语言。伊利格瑞将女性的性特征和女性主义的政治目标与“女性话语”结合在一起,试图运用此女性语言为女性自身的感受发声,其特点是缺乏逻辑、歧义丛生、重复晦涩,且充斥隐喻和戏仿,但却是一种值得肯定的声音。它向父权制社会中所有原有的理论挑战,即,女性需以自己的声音重塑自己的历史,消除偏见和谬误,争取权利。

(三) 茱莉亚·克里斯蒂娃和她的“记号语言”

茱莉亚·克里斯蒂娃是当代法国极具特色且成就极高的女性主义理论家,她对精神分析学、马克思主义、解构主义、结构主义、语言学、符号学等都进行了研究并有所吸收,因此,她的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和实践融入了精神分析学、符号学、语言学等相关理论和观点,具有鲜明的特点。在《诗歌语言的革命》中,克里斯蒂娃系统地阐释了记号语言分析学概念与原则,在吸收和发展拉康理论的基础上,她通过对“记号”和“象征”之间的异同辨析,从而替代了拉康之于“象征秩序”与“想象”的区别,对于儿童的无意识语言在想象阶段的活动状态,克里斯蒂娃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不同于索绪尔的符号,克里斯蒂娃的记号(the semiotic),对应于前俄狄浦斯时期的多种驱动力,及多种类型的性感区。记号是在前俄狄浦斯时期产生的,此时,主导婴儿心理的驱动力是源于与口腔及肛门等有关器官的基本冲动,即原始的力比多驱动,所有这些冲动是不断流动的,并且都包含在母性空间(chora)中,克里斯蒂娃称这些冲动的最初组织为“记号”,克里斯蒂娃宣称,在这个时期,婴儿模仿最初语言的形态就是语言的记号形态(黄湘芳,2006)。当主体进入“象征秩序”后,源于母性空间的记号就会受到与父权制社会秩序、律法相连的代表“象征”的语言的压抑,正如伊格尔顿所描述的那样:记号是语言的他者,又与语言纠缠在一起。记号来自前俄狄浦斯阶段,所以它与儿童和母亲的肉体接触关系密切,记号不仅仅是属于女人的语言,因为它产生于前俄狄浦斯时期,一个尚未认识到性的区别时期(伊格尔顿,1988)。

克里斯蒂娃把这种记号学的“语言”作为破坏象征秩序的一种方式;它反对象征秩序的一切抽象的、固定的含义。记号学是复性的和流动的,是一种对确切意思的创造性超越,它使严格区别男性与女性之间的界线陷入模糊和混乱。记号学是一种“双性的”写作方式,它消解一切二元对立,这种对立乃象征秩序赖以生存之

基础,颠覆了“菲勒斯中心主义”单向结构,成为一种革命性的理论,也为语言、知识和历史的更新提供了驱动。

四、结语

纵观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对精神分析学的探讨已远远超出了性和欲望的范围(罗婷,2004),它主要从文化、语言、心理和生理的角度分析,认为男性利用生理上的性别优势以建立男性的文化社会体系,这种分析无疑是创新的和有利的。然而,一方面,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否定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精神分析学说的相关理论;另一方面又以其某些方法和理论框架来建构自己的批评理论框架系统,于是难免使其陷入新的理论困境和矛盾中。

“身体写作”“女人话语”“记号语言”都是非线性和超现实主义的实验性文本,它们削弱了西方叙事传统中的语言、句法和传统规范,要求作家使用隐喻、双关、省略或跳跃式的语言,打破常规的句法结构,语义学甚至逻各斯的笛卡尔逻辑,因而,这种写作模式是颠覆性的(李小林,1999)。但由于都过分强调性欲经验和生理特征,而忽略了社会现实,因而引来了不少诟病和质疑。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肖沃尔特指出:“依据精神分析模式的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者们必须超越精神分析学,采用一种能将女子创作置于文化大语境中的、更富有弹性,更为全面的女子写作模型。”(Showalter,1985)。

参考文献

- [1] Elain, Showalter. The New Feminist Criticism. [M] New York; Pantheon. 1985
 - [2] 黄华. 权力, 身体与自我——福柯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 [3] 黄湘芳. 论克里斯蒂娃的女性诗学[D]. 硕士学位论文 湖南: 湖南师范大学, 2006
 - [4] 李小林. 论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批评[J]. 妇女理论研究 1999(3): 13-18
 - [5] 罗婷.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西方与中国[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4
 - [6] 苏红军. 西方后学语境中的女权主义[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 [7] 特里·伊格尔顿. 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 伍晓明译[M].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8
 - [8] 张京媛主编. 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 作者简介: 尹慧凌, 女, (1999.10-), 汉族, 江西吉安人, 本科生, 研究方向: 外国文学、比较文学。